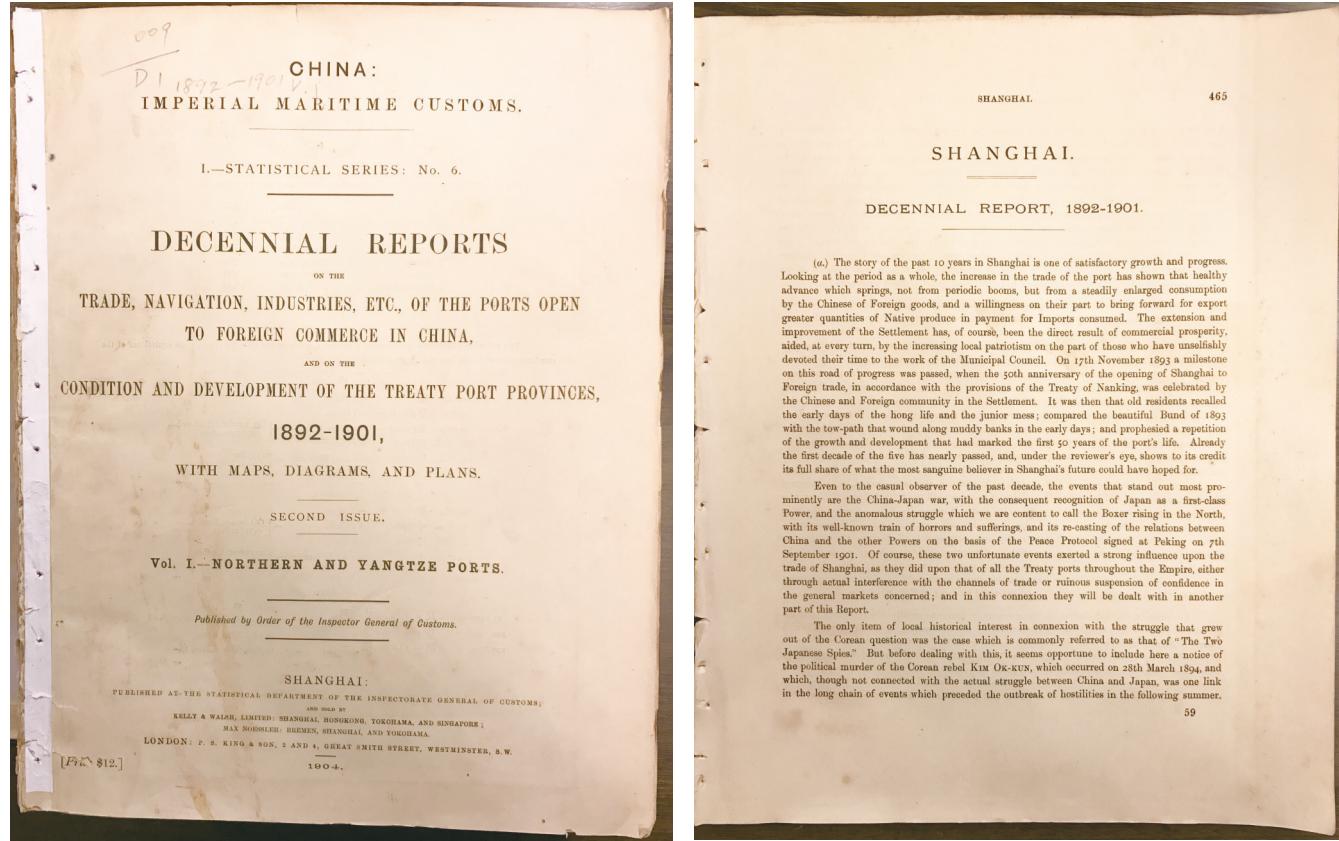


“外国人理应到南通去参观游览”

□朱江

班思德的这段话,已经成为评价张謇及张謇时代的南通的经典,如今被很多人引用。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这段话,即南通取得了令外籍人士感慨的成就,成就的取得主要归功于张謇的引领,这些成就综合之下,使得南通成为中国一个独特的城市。



《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封面及内页,原件藏徐家汇藏书楼。



见。

南通成为模范城市应归功于张謇先生的悉心经营。南通是一个不靠外国人帮助、全靠中国人自力更生建设的城市,这是耐人寻味的典型。所有愿对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将来作公正、准确估计的外国人,理应到那里去参观游览一下。

班思德的这段话,已经成为评价张謇及张謇时代的南通的经典,如今被很多人引用。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这段话,即南通取得了令外籍人士感慨的成就,成就的取得主要归功于张謇的引领,这些成就综合之下,使得南通成为中国一个独特的城市,即两院院士吴良镛认为的“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产物,它不同于租界、商埠或列强占领下发展起来的城市,是中国人民基于中国理念,比较自觉地、有一定创造

性地、通过较为全面的规划、建设、经营的第一个有代表性的城市。

类似的对张謇和南通的赞誉,在同时代很多外国人的文章里都有体现。查尔斯T·保罗在1919年出版的《中国的召唤》一书的南通部分,认为“让南通从中国所有城市中脱颖而出的原因,是由于在中国人少有的主动精神影响下,它成为改革和发展最有成效,进而也是最声名鹊起的地方”。对于张謇在南通崛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查尔斯T·保罗的评述相当到位:

这座河边大镇在过去十多年中逐渐发展成了现代化的模板,而促成这一转变的主要功臣就是被众人视为“全中国最慷慨、最热心公益”的张謇。作为一名前清朝政府的翰林学士,张謇后因支持共和而出任袁世凯第一任内阁成员,成为农商总长。这位富有远见及行动力的百万富翁、地主、实业家兼政治家辞官回到故乡,在那里打造他自己的新梦想。他在当地主导的市政建设以及公益项目使南通成为了许多省市的瞩目之处,为这个刚萌发民主嫩芽国家里的富人树立了爱国主义与利他主义的新榜样。

在南通发展的过程中,天生港自开商

埠是重要一环,也是张謇开放胸襟的体现。1906年清政府批准天生港暂作可以起下货物之不通商口岸。天生港在江海关管辖范围,开埠工作得到江海关技术上的支持。1907年2月22日,好博逊派江海关副理船厅鹤而生,与大生纱厂的翻译一同搭乘“鄱阳”船,前往南通测看天生港埠头事宜。鹤而生回上海后向好博逊禀报了天生港码头建筑的基本情况,如“码头现已在动工创造,自岸边起至江心筑木桩250尺。外筑浮桥两顶,自25尺至30尺长,15尺至20尺开阔,一边放在方木桩之上,一边放在平底驳船上之上。另外再作浮桥两顶,长30尺至40尺,阔15尺至20尺,接连趸船”。此外对用作趸船的“威靖”兵船,以及另外一艘“铁壳鸭尾船”如何移放码头,提出了技术上的建议。1907年10月22日,根据总税务司的要求,作为江海关税务司的好博逊又把后续产生的涉及天生港开埠的往来函件,包括上海道瑞激迭次给江海关的来函,汇总上报税务处。之后在好博逊给瑞激的另外一封信中,还附录了江海关所拟的天生港征税试行办法、查勘埠头趸船绘图的说明等。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史海回眸

50年前的猪价与肉价

□程太和

元,五头猪可卖到300元。对农民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生猪出售了,还有粮食、化肥、布票等奖励。过去,食品站的收购员是相当吃香的。我们班上有个同学的父亲在食品站工作,学校里的老师家中要卖猪的时候,就与这个学生套近乎,有的还请这个学生一起到食品站去帮助卖猪,跟收购员打个招呼,生猪称重时,食物少减一点,上下就能相差几元钱。那时,教师的地位显然不如食品站的收购员。收购员嘴上叼着烟,耳朵上夹着烟,咋一个“气派”了得。1977年至1978年,生猪收购价格略有增长。1979年至1984年,生猪收购价格先后两次调整,由每50公斤均价49.25元调至每50公斤均价64.30元。60年代至70年代,每户家庭还有一头猪0.1亩的饲料田。1985年后,生猪收购价格放开,食品站的好日子也算走到头了。

关于肉价,我清楚地记得,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期,价格基本上是每斤0.74元,咸肉价格每斤0.82

元,有极个别年份的夏天,生猪大量上市,猪肉敞开销售,鲜肉价格一度降为0.65元。那时,羊肉的价格是每斤0.60元,比猪肉价格便宜。过去,生猪的宰杀由食品站负责,没有食品站的地方,供销社宰杀生猪。50年代至70年代初中期,南通地区内最大的生猪加工企业是如皋肉联厂(初名“如皋毛猪加工厂”),1976年海门四甲建起了肉联厂,1982年南通也建起了肉联厂。80年代初,海安在县城西南隅小焦港河边建起了肉制品厂(后改称“海安肉联厂”)。几个肉联厂的建立,南通地区生猪加工冷藏能力大为提升,对外活猪调拨逐年减少。过去,生猪收购价格便宜,鲜肉销售价格也便宜,但农民很少有能力购买鲜肉。可以说,农民除了卖猪时,买点肉招待一下帮助卖猪的人,其他时间一年到头也不买肉,只是过年过节的时候,生产队宰杀两三头猪分给农民尝点腥味。农户家中卖猪时称上两三斤肉,家中的孩子想大快朵颐的吃肉也不可能。我有个邻居,家中有一个小男孩,是长房长孙,爷爷奶奶宝贝得要

命,抱在手上怕跌了,含在嘴里怕噎了。有一年家中卖了三头猪,称了几斤肉招待帮忙的人,还请来了生产队的干部做陪。八仙桌上,一碗红烧肉,再加上一盘大蒜爆炒肉片,小孩坐在门槛上,看着很眼馋,嘴里不停地咽着口水。过了会儿,小孩跑到厨房里跟奶奶说:奶奶,他们把肉吃得差不多了。奶奶说:他们吃的是肥肉,瘦肉剩下来留给宝宝吃。小孩跑过来一看,碗里的肉全都吃光了,又跑到厨房跟奶奶说,他们把肉吃光了,我那有得吃?奶奶说:不要紧,还有肉汤哩!肉汤泡饭最香,我孙子最喜欢肉汤泡饭。小孩又跑过来了,一看,糟了!大人们把肉汤也喝光了!小孩哭着跑到厨房,跟奶奶说:奶奶,你骗我,他们把肉汤都喝了。奶奶说:小宝贝不要哭,奶奶在灶角顶上还放了一个肉骨头留宝贝吃的。奶奶将肉骨头拿下来给了小宝贝。小宝贝一手拿着肉骨头,一手揉着眼睛上的“猪屎(眼泪)”,脸上露出了说不出的笑容。

50年前,猪价很便宜,肉价很便宜!但那时想吃块肉,难怪!

“崇川”与“崇州”

□黄浪

为因刘太后之父名刘通,刘太后为避嫌而改通州为崇州。关于“崇”字的来源,《读史方舆纪要》和嘉庆《大清一统志》都表示该称呼源自当时南通管辖的崇明镇之名。值得一提的是,今崇明城东有一条崇州路,但崇明历史上只设置过崇明州,从未使用过“崇州”一称。“崇州”指的是南通,崇州路之名难以彰显崇明的历史文化。

“崇州”之名的使用时间很短暂,不过它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它派生出了“崇川”这个称呼。在宋代,州一级的行政区划单位,除了具备一个正式称谓外,还拥有至少一个官方赋予的别称。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称“滕子京谪守巴

陵郡”。巴陵郡其实是岳州(今湖南岳阳)的别称,并非正式区划单位名称。那当时南通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宋代另一部地理名著《方舆胜览》的第四十五卷中称南通“郡名‘通川’‘崇川’”。当时南通有“通川郡”和“崇川郡”两个官方别称。可见,崇州是南通的正式称谓之一,而崇川则是相对文雅的美称。

可以发现,崇川之于崇州,和通川之于通州的情况十分相似,“州”“川”二字在地名上有时是通用的,这在全国各地的地名中都有体现:四川达州市设有达川区,“达州”和“达川”并存;重庆的合川区,历史上叫过“合州”;陕北榆林一带旧有名城银州,又称“银川”;山东淄博下辖有淄川



历史人物

苏中金融战线的“金刚钻”邓白

□白本

在我的家乡,江安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在历史上,江安一度改名邓白乡。邓白是一位烈士的名字。他的故事至今流传在江安人民的口中。

邓白(1921—1946),原名邓修相,字树藩,阜宁县施庄乡人。5岁读私塾,他自幼很聪明,尤爱诗词歌赋、书画金石。1938年秋,他考入盐城高中。1939年,日军侵犯苏北,学校解散,他进入兴化的江苏省战地实验中学读书。他品学兼优,坚信救国救民的真理,秘密加入校内党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40年的夏天,日军偷袭学校。大难当前,邓白临危不乱,抢救伤员。他背着受伤的同学刘于九连跑10多里路,到达安全区域,又出钱为同学治好伤痛。秋天,他接到党的命令,动员进步同学,结伴进入盐城“抗大五分校”学习。抗大五分校全称为中国人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五分校,于1940年11月在盐城成立,陈毅兼校长和政治委员,赖传珠兼副校长,冯定任副校长。邓白成为该校创办初期的学生之一。一年后邓白毕业,从此他进入金融战线工作,先后出任苏中三分区税务管理局第二总局宣堡分局主任、泰县财政经济局(简称财经局)任副局长、泰县财经局局长、靖江县财经局局长等职。作为一名党员,他像老黄牛一样,勤勤恳恳地在红色金融战线上耕耘:冒着生命危险,挺进边区,开辟财源,编写宣传手册,鼓舞人民斗争,揭露敌人诬陷,最终超额完成上缴的税款任务。

具体说来,1943年春,邓白出任泰县财经局副局长。在区乡游击队的配合下,他带领财税干部下乡征粮,保障军需民食。他还编写《宣传提纲》,发放给民众及基层干部。邓白的征粮工作甚至推进到敌占区,一时间,泰县财政经济困难的局面出现明显好转,保证军政供给的同时,还有大量的结余。这些无疑都与邓白认真工作有着密切关系。

1944年4月,邓白接任泰县财经局局长。他会同敌工部门人员,积极合作,宣传解放区商业政策,动员商人前往解放区开店做生意,鼓励解放区商人出境做生意,有效地繁荣了解放区的商业。他还积极组织各种生产和消费合作社,亲自在雅周办起公私合营的惠民公司,帮助雅周区成立区合作联社。泰县及其周边解放区的市场,变得活跃起来,可谓欣欣向荣。

有了泰县的成功经验,邓白受到上级青睐,于1945年春,被调往靖江,出任财经局局长。次年初夏,他接受组织安排,前往靖江东部的靖东区,负责“五四”土改工作。此时,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白色恐怖笼罩整个苏中大地,敌人“还乡团”肆无忌惮地出击,欺压民众,抓捕革命人士。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邓白日夜奔波,走家串户,组织翻身农民拿起枪,举起刀,保护自己的田地与家园。他还率领武工队深入柏木桥、新港等据点的周围地区,发动群众,狠狠地打击反动分子,胜利完成土改任务。他还培养出一批骨干力量,团结广大群众,为后来的坚持斗争打下深厚的组织基础、群众基础。

1946年下半年,如皋一带白色恐怖越发严重,斗争越发残酷。组织上考虑到邓白工作积极,经验丰富,又将他调来如皋,出任如皋财经局局长。妻子离别如皋,前往苏中党校学习。他为妻子送行,不曾“儿女情长共沾巾”,而是充满党性地向她告白:“你去学习,我就无后顾之忧了,可以全力以赴与敌人斗争到底。”他还叮嘱妻子:“要为革命安心学习,学好本领,为解放全中国,为建设新中国作贡献。”11月,邓白在江安区召开县区两级财经干部会议,动员部分人员北撤,同时动员部分干部同他留下,坚持在南线战斗。他对留下坚持斗争的同志深情地说道:“要做一个金刚钻,经得起烈火的考验,切切不可做牛屎,火一烧一堆灰。”11月6日晚,邓白带着同行人员路过江安区周丁乡,便在农民孙荣庆家吃饭休息,此时,他不幸被民兵误伤牺牲。如皋人民不忘这位金融战线的金刚钻,将江安乡更名邓白乡。

朱兆蓉籍贯辨

□彭伟

朱兆蓉是近代篆刻家,关于他的籍贯,诸家说法不一。

《遂昌西乡世界》记为“遂昌知县朱兆蓉(泰兴籍)”。此说不实。许多诗文及部分资料书籍均记载朱兆蓉为如皋人。《清授资政大夫知遂昌县事美镜朱君墓志铭》就言“君讳兆蓉,字美镜,江苏如皋县人”。包兰瑛自言:“泊光绪壬辰,归如皋朱氏”,而非泰兴朱氏。诸如此类的佐证,举不胜举。

朱兆蓉是如皋人无疑。民国时期,如皋一度管辖今天的如皋市、如东县及海安、泰兴两市的部分区域。朱兆蓉是如皋何处人呢?笔者翻阅全套《如皋范湖洲朱氏族谱》,一无所获。幸有《东皋印学》留下线索:“朱兆蓉,清末如皋县丰利(今属如东)人。”如东无误,丰利不准。读遍《丰利镇志》,一无朱兆蓉,二无《听泉楼印谱》。

朱兆蓉实为清末如皋潮桥人。清末学者、道光二十五年进士李联琇(1820—1878,江西临川人)为朱霖《旷观楼诗存》作序:“如皋为崇州属邑。邑东有潮桥镇。镇离州北东百余里、县东九十里,朱氏聚族其间。”清末,朱氏族人聚集潮桥朱家园,富甲一方。《潮桥志》记载,“南朱家园”(后为潮桥中学),原系地主朱元宰的庄园,一进七堂,中有小木楼,名为“旷观楼”“听泉楼”,毁于抗战时期。诗序溯源,木楼留痕,朱霖无疑是潮桥人。

《潮桥志》又清楚地记述“朱鼎文为潮桥人”。祖父、伯父的籍贯一清二楚,朱兆蓉无疑也是潮桥人。朱昌仁乃朱兆蓉后人,曾向笔者表示,其祖从掘港迁来潮桥,融入朱家园,朱兆蓉肯定如皋潮桥(今属如东)人,绝不会是丰利人,而且1917年朱兆蓉最终下葬于如皋县之岔河镇(今属如东县)西石家庄,毗邻潮桥。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老建筑、历史人物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崇川区是南通主城区,“崇川”之名因此声名远播。近年随着中央创新区的发展,一条宽阔整洁的大路——崇州大道应运而生。南通的旧称“崇州”也再次进入大众视野。“崇川”和“崇州”笔画相似,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呢?

在南通区划沿革史上,“通州”是南通最常见的称谓,另外还有“静海”和“崇州”。“崇州”存在的时间很短,宋代的地名著《舆地广记》记载:“皇朝天圣元年改崇州,明道二年复改。”天圣元年为公元1023年,明道二年为1033年,崇州存在的总时间只有十年,明道二年重新收回了“通州”的称谓。

关于通州改名崇州的原因,一般认